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67期（民國99年3月），1-15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黨國民主」與三代海外華人的進與退*

王賡武**

一、前　言

在進入到本文討論之前，有必要針對題目稍做解釋和說明。什麼是「黨國民主」？在我看來，這是一個以政黨為中心的國家，雖然它有邁向民主的目標和理想，但是，總認為無論國家的穩定和強盛，還是百姓安居樂業與否，靠的是政黨來集中權力。同時，這樣的黨國體制，領導階層本身需要果斷的能力，建立威信，才可管理有方，甚至比個人自由和個人的政治權利重要。如此的政權也會利用民主的口號和方式，它們對於「民主」的定義，在乎的是「親民」或「保護國民」，而不一定聽取人民的意見。

至於所謂「三代海外華人」，大致上時間的劃分如下：民國成立前後最初三十年間為第一代(1910s-1940s)，他們多數是在光緒年間所出生的；第二代活躍的時段約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及戰後(1940s-1970s)，他們主要是辛亥革命後出生；而活躍於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三代(1970s-2000s)，則都是二次大戰後出生的。至於「進」與「退」這兩個概念，「進」是表示海外華人熱心於支持

* 2009年12月10-11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舉辦「九十年來家國：1919．1949．2009」國際學術研討會之主題演講稿，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林志宏先生整理。
** 中央研究院院士、新加坡國立大學特級教授

中國的發展方向，擁護國內的新制度、接受新思想；而「退」則是把重點移到冷靜地觀察，態度上多少有些疑慮，認爲需要細心斟酌，甚至可能完全反對。

當然，海外華人從境外來看中國是一個很大的課題，不管中國是指中華民國也好，還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好，其實要探討的變數很多，許多變數在這裡都不可能得到充分而周詳的考慮。我僅關注以下三個方面，並嘗試加以說明。第一，大部分海外華人分布在「南洋」，是本文觀察重點，但分布在北美洲和澳大利亞、紐西蘭（三地簡稱「美澳」）的華人社群也很重要。至於其他地區，由於人數較少，此處暫且不談。第二點還要注意的，是本地生長的華裔（他們業已歷經好幾代的活動）和後來移民的「新客」之間的區別，包括他們在人數上的比例，以及他們受當地教育或受華文教育成長下的不同觀點。另外，他們所居留的國家各有不同的移民政策，這些國家的體制與中國制度又是如何不同，也值得一併考量。最後一點，我們還需要考慮到中國自身的情況：國內要看是處於統一還是分裂之局，及地方的行政效率高低等問題；國外則要特別注意中國的國際地位，究竟處於強盛還是衰弱之局。

照我看來，屬於辛亥革命之後躍上舞台的第一代，不管是土生或是新客，大體上都非常歡迎革命的成功。他們認爲趕走滿清皇朝，改朝換代以建立中華民國，基本上都符合內心的想法；而唯一的要求，是希望中國能夠快快復興，避免被外來列強所欺侮，同時重建中華民族的自尊心，使得華僑在國外生活也能得到較好的待遇。幾乎可以說，所有海外華人都以國家統一、家鄉安全、生活穩定爲期望目標；因此，軍閥在中國各處奪權橫行之際，華僑對他們尤其反感；對國民黨和共產黨的鬥爭，也常有批評，尤其是對各省地方政府管理不得法，屢有腐敗的表現，甚覺不滿。但是，差不多就在蘆溝橋事件發生之後，華人對日本侵略的看法和態度是一致的，所以抗戰期間，大多數在外的華人都可稱做是愛國華僑。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第二代華人，則面對相當複雜的過渡時期。以南洋各地爲例，主要都是新興的獨立國家，這些國家基本上有他們自己的民族主義，

都不樂於讓華僑的愛國精神仍舊在他們的國度出現。至於對中國大陸的觀感，又因爲共產黨獲得最後勝利，問題變得相當複雜。由於政治觀點的分歧，有些國家在態度上親共，有些則是堅決反對共產主義；它們各有不同的對應中國的政策，當然對待華僑的態度也隨之有異。華人社群之間於是被政治主導，重新產生分裂。儘管許多華人聽到毛澤東呼喊「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之際，深受感動，但是，不管在南洋或美澳，他們如果想要繼續居留下去，主要仍須思考怎麼樣去面對認同和效忠居留國等切身問題。此外，他們長期經歷冷戰帶來的各種政治壓力，對於大陸和台灣的一黨專政，各有不同的反應。可是，年輕的土生華裔，漸漸開始對中國的一切有所隔閡，總體趨勢乃朝向認同本地政治的道路上走。

至於最近三十年的第三代海外華人，看到的是一些不可想像的巨大變化。例如，大陸在歷經改革開放以後的經濟迅速發展，而台灣從經濟落後國家變成進步國家、又開放黨禁和報禁，迅速民主化。海峽兩岸的情勢改變，令他們面臨了不同的抉擇：一方面，大陸的黨國政權似乎漸有進步；另一方面，台灣的民主政治也很快地趨於成熟。到底是經濟的發展成功重要，還是要以人民的權利優先？都值得他們細心斟酌。當所有海外華人，面對兩岸如此幾乎不可相信的激變，難免反應不一。可以這麼說，其中有不少年輕華人，會特別感到他們實處於一個進退維谷的三岔口。

綜合上述，且讓我進一步分析這三代如何看待中國的黨國民主發展。

二、第一代海外華裔對中華文化的認同

前面提到，中國境外的華人社會，主要分佈在「南洋」與「美澳」。其實這兩個區域的性質和歷史背景很不相同，應該分開來談，這裡我是以南洋爲主，並比較美澳地區的情況。至於其他地方，因爲華人人口很少，雖然他們的生活環境都各有特點，也很有意思，限於篇幅，就暫時不談。

南洋華人最突出的，是當地華商已有數百年的歷史。他們跟外國政府的相

處接觸，經驗最爲豐富。有些地方甚至還建立類似政府的體制，但是大多數地方有當地土著的政治體制，像暹羅、安南、爪哇等，至於馬來半島則有蘇丹；另外，又有歐洲君王在東南亞陸續成立的殖民地行政機關，法國和美國兩共和國在印支半島和菲律賓就分別建立他們的殖民地統治。華商多數來自閩、粵兩省，本來就是滿清帝國下的皇民，因此，他們雖然遇到各種不同的政權，都不會感到驚奇，似乎也沒有表示任何意見，而是儘量去適應當地的環境。值得留意的是，其中有些政權還得倚賴華人經商的能力，所以各地富有的土生華裔家庭，具有相當程度的社會地位，有些人甚至還掛上當地國王或殖民地政府的官銜，成爲華人族群中的領袖。

後來大量到南洋充當勞工的新客，多半倚靠華裔商人的勢力謀生，時常由華商爲他們安排旅費和住宿，甚至指派工作。但是，各地的政治情況迥異，採取的政策不同，當地華裔對待新客也就有所差別。譬如，往往華人人數較多的地方，像泰國、馬來亞、東印度群島等地的情況就相當複雜。他們除了有彼此互相爭鬥的會黨之外，還有其他各種方言群、各行商業、各類職業等的組織。到二十世紀初，這些組織之內又有社會階級之劃分。還有一點尤須注意，各地華裔與新客的教育背景也不盡相同，就讀私塾或華文學校的華人，跟那些上過殖民地或教會學校的華人，會有不同的家鄉觀念，對待中國的態度也就不一樣。但無論如何，一般說來他們都非常認同中華文化，希望外國的政權能夠尊敬滿清皇朝，認爲唯有中國富強，他們才能以身爲中國人而自豪。

至於「美澳」則不然。當地的華僑人數比較少，不管是工人或者商人，經常都會受當地官員的氣，常被他們欺負。更令華僑們不服氣的，是那邊的白種工人個性粗魯無知，種族概念又很強，同樣是外來移民，但總認爲他們是多數者，又是先來到「新世界」者，應該享有「地主」的權利。並且，白種人又以爲歐美西方比中國人的文化要高雅許多，根本看不起華商和華工。在那種情況之下，當地華僑並不會重視什麼進步價值的民主選舉方式，因爲少數服從多數的政黨政治，根本沒有給他們帶來任何好處。讓他們比較感興趣的，反而是西

方政府的重商政策，包括運用資本對國家經濟財政之重要，還有各方面利用法律來保障商人的利益等。儘管華僑自身並未能夠享受到被保護的權利，但還是欣賞西方人的那套想法。

當然，南洋、美澳的新客，其實也有共同的地方。比如他們一般多半是單身漢，同樣來自華南，稱呼中國爲「唐山」，同樣地關心家鄉的發展。他們把工作所積蓄的錢，不斷地寄回家去，提供造橋、鋪路、修房等建設。他們也都以方言群做爲主要的組織對象，並且重視自己家鄉的風俗習慣，堅守和擁有各地地方信仰。清末時期，當他們開始關心「文教」、「教化」問題的時候，也同樣懂得把傳統的士大夫文明，和朝廷所指定的考試文化當做正統。但是在他們之間，對於「中國」可能還是只有比較模糊的概念。

由此我們也可以明白：像康有爲、梁啓超那樣士大夫階級出身的學者，在華僑眼中，很明顯地代表正統文教；所以那些受過一點教育的華商，自然把兩人的思想當做是正統。而孫中山並沒有那樣的出身背景，儘管曾經受過西方的科技教育，也讀過一些古書，可是受到的待遇就很不相同。不過，康、梁和孫中山在南洋的形象，以及當地華僑對他們的種種反應，實際上更爲複雜。

在南洋歷經好幾代的土生華裔，實際上跟新客對待中國的態度不同，而且各地的華裔之間，也存有一些相當歧異之處。例如，泰國和菲律賓兩地的差別就很大，前者政治上有國王體制，後者曾是共和國的殖民地。更重要的是，宗教信仰的差距特別顯著。在泰國，大多數人信仰的是佛教，而在菲律賓，很多華裔信仰的是天主教。因爲具有不同的宗教信仰，當然會有不同的道德觀念，甚至是不同的政治思想背景。泰國的小乘佛教終究還是比較接近中華的大乘佛教，所以，泰國華僑看待中國老百姓的生活，多少存有同情，也比較容易瞭解。反而是相信天主教的華僑就會感覺到，自己家鄉的信仰近於迷信，不太容易能接受。

至於新客，他們本來生在中國，直到成長以後才到南洋謀生，與土生的華裔在語言上不通，生活習慣又大不相同，教育背景更不一樣。因此，他們個人

的價值觀或世界觀，乃至對政權的態度，都有很大的差別。

另外有些地方，像是荷屬地區和英屬地區，也有很多不同之處。譬如，荷屬爪哇的土生華裔比較多，這些老牌而富有的商人家庭，在當地的社經地位也比較高。因此，他們對於中國的期望，常常跟剛從唐山來的同胞有所不同。這些土生企業家，往往希望中國發展成功，讓他們也可以有機會到中國去投資，但他們已經跟家鄉完全失去聯絡，連家鄉位居何處也不一定知道，所以多數並不願意參加國內任何的政治活動。新來移民則不然，他們雖然不一定有錢，也沒有受過什麼教育，但是，他們多少懂得中國內地政治，也瞭解地方軍閥和中央政府的矛盾。那些關心國家大事的華裔新移民，則更容易捲入參與中國的政治活動。像是南洋華僑，多數是來自福建和廣東兩省，本來就對北方滿族存有偏見，一旦聽說孫中山要革滿清的命，多半都願意站出來支持他的革命運動。尤其是那些窮苦的工人，想到要中國改朝換代，讓漢人──特別是來自南方的閩廣勇士英雄──成爲新朝代的皇帝，便奮不顧身地表示擁護。

當然，國家到底要如何發展，採取什麼制度、什麼策略，如何處理外來的侵略和經濟壓力等各項大事，南洋華僑僅能遠在境外觀看。他們理想的中國，是應該改良傳統的政治制度？還是要走政治革命的道路？或者繼續保有皇朝政權？還是重新建立一個嶄新的民主共和國？這些最終結果，似乎都不太重要。南洋華僑認爲最理想的，是漢人的中國能恢復幾千年以來所享有的威信，再度成爲一個令人敬仰的中華文化。

美澳的情況則不同。在那裡，不管是華商或者華工，都是新移民；他們沒有得到自己國家的外交庇護，一旦來到了自由且混亂的環境，難免要受歧視、被欺負。加拿大、澳洲和紐西蘭本來是英格蘭帝國的屬地，滿清朝廷跟這個強大的、全球性的帝國進行交涉時顯得軟弱，多少還可以瞭解；但對美國的華僑而言，看到清朝與美國政府建立外交關係後，多次談判提到華僑待遇問題，都毫無結果，便感到特別難受。等到孫中山及同志們發起推翻滿清的運動時，可想見是很受群眾歡迎的。同時，他們也注意到當地自由和平等的政治文化，希

望以獨立民主的精神，來建立一個又富又強的國家。由此，革命黨的口號當然要比保皇黨響亮，乃至談到放棄漢唐傳承下來的皇帝制度，改用「共和國」來代替，也似乎很自然地可接受。所以，在辛亥革命前後，美國華僑表現支持的態度就很明顯。可惜的是，他們被當地的移民機關運用各種方法排擠，人數不停地削減，結果影響力還是很有限。

另外「美澳」華僑還有兩個特點，値得一談。首先是美國重視文化的影響（也就是現在所謂一種軟實力的外交政策），歡迎中國學生前往美國，接受現代化的教育。因此，中國知識分子很早就體驗到美國的大學教育精神。其次，美國的傳教士活動又特別活躍，隨時有「教化」中國迷信者的野心。雖然他們的收穫有限，但這仍是中國人「西化」和現代化過程的重要成分，在華僑社會裡，具有相當的影響。所以，當民國成立之後，「五四」運動關於科學與民主爭論，美澳華僑並非盲目跟從，而是有相當程度的瞭解和欣賞，也願意熱心參與各項政治活動。對於中國的前途，他們具有非常高的期望，認爲要想讓中國強盛，必須能夠吸收新進的科技方法、法治精神，乃至工商管理原則，並且跟中國傳統的思想結合起來，最後成爲一個進步的、文明的國家。

南洋華僑之間，實際上也有像美澳華僑那樣熱心愛國、支持革命的，但是具體的情況比較複雜。他們人數雖然多，但幾百萬人分散在五、六種政權統治之下，顯得相當分歧。領導他們的土生華裔領袖們，因爲都是商人，態度比較保守，只想盡力保護他們既有的本地官銜和利益。儘管有些人曾經接受本地或殖民地學校教育，得到不少新進思想和科學知識，並且能夠欣賞革命、共和、自由、平等、民主等概念，可是他們也明白：當地不管是泰國的君王體制也好，還是殖民地政府也好，基本上都不歡迎華人參加任何中國的政治活動。

此外，有些南洋華僑曾在歐洲留學，有他們獨特的看法和意見。比如說，生長在英屬馬來半島的辜鴻銘，他從西歐留學回來，便認爲西方宗教根本就是迷信，而西人民族性野蠻，民主造成政治情勢混亂，根本比不上中國的政教傳統。同樣生長在海峽殖民地、曾到英國留學的林文慶，反而希望中國能夠學習

日本維新教訓，聽取甚至重用像康有爲那樣的變法思想策略，儘量改良中國傳統的政體，追隨西方的進步文明。不過，南洋這類的人到底比較少，影響的層面有限。

辛亥以後，中國的租界、香港及沿海港口都市，人才輩出，包括工商界、科技和學術界，以及政府的高層官員，幾乎每一行都冒出了許多清新而有眼光的傑出人士。可以說民國最初三十年的海外華人，對於中國應該如何進行現代化道路，倒是很願意聽取國內新領導層的意見，甚至留心他們的各種建國方針。尤其那些新客的子弟，當開始進入到華文學校接受國民教育時，他們的老師都是經由中國培訓後所派出來的專業教師；使用的課本則是中國的教育部請專家編成的；所抱持的政治觀點，不是來自南北首都的新國民愛國愛民思想，就是「五四」運動以後的進步思想。那時，各地華僑也都接受主流的看法：在建國的關鍵時期，必須要用一黨統治的方法，才足以抵禦外來強權的侵略。至於民主觀念的施行，無非是一個理想，可以等到國家安定之後再行考慮。

「五四」前後，國內的軍閥跋扈，國民革命軍北伐後造成國民黨內左右兩派分裂，之後的政治鬥爭又導致雙方流血，互相殘殺，遂致日本、蘇俄插手干預中國內政，竟爾輕啓兵禍，蠶食鯨吞中國領土。國家面臨如此危急存亡之秋，其程度是從來沒有見過的。各地華僑每每看到家鄉治安情況日趨混亂，而國民黨官方的管轄範圍有限，中國人似乎完全不能統一。僑居海外的中國人，非但不能安心返家養老，還得繼續居留外國；除了寄錢回家幫助養活親老外，並且還不斷地鼓勵親友們出國謀生。結果，華僑社會再次被分化。有些人深感不平，於是參加各式各樣的黨派活動，一方面跟隨大家擁護抗日愛國救亡運動，另一方面則有部份組織，肆意批評國民政府對內管治不當，對外則軟弱無用。還有一部份土生華裔，因爲對政治現實失望，放棄回歸中華民國，之後轉向於關心本地政治，儘量爭取他們留居本地的華人應有的權利。

南洋與美澳華僑在認同方面的分野，可自日本 1942 年佔領東南亞的三年八個月期間中看出。由於南洋華僑遭受非常殘酷的迫害，土生的華裔得以充分

覺悟：他們絕對逃避不了自身的血緣關係，在外國人的眼裡，無論如何到底還是中國人。換言之，他們的命運實與中國密不可分。美澳華僑則比較幸運，因爲當地政府態度上同情中國，願意站在中國一方，共同打敗日本帝國主義，那邊的華僑立場於是乎簡單許多，甚且社會地位也隨之改進。他們普遍希望：中外能夠進行長久合作的關係，讓中國得有機會，重新建立一個強大的國家。

總之，二十世紀前半期各地的華僑，雖然各有不同的反應，基本上還是希望中華民國能夠收回主權，自力更生，也藉此讓各地的中華民族都能抬起頭來。

三、戰後「不斷繼續革命」風潮下的第二代

第一代海外華人所接觸的革命，是中國的民族革命、政治革命，不僅改朝換代，並且建立了一個嶄新的共和政權。然而，這種改變不止針對於體制方面而已，實際上新的政治力量也促使社會各階層自覺，進而引起經濟、社會及其他方面的改革要求。只不過，變化仍舊屬於中國內部的發展過程。

戰後第二代的情形則有所不同。從華僑的觀點來看，這正是一段超越中國國界的反帝國主義時期，南洋各地的每個族群、每個區域，都各自有其民族主義的新領袖們，不斷進行民族解放鬥爭，爭取獨立自主。因此，海外華人在面對去留的抉擇時，遭遇重大挑戰。

另一方面，這些新思想又是歐美知識分子從工業革命以降所發明的，也是一場全面的哲學革命。最初目的是爲了要對抗強權的宗教勢力與專政的王權，後來則更進一步發展，階級鬥爭成爲主流，之後就變爲全球性意識形態的激烈鬥爭。直到二次世界大戰後，這場鬥爭更擴大演變爲兩種政治主義，由強權的美國和蘇聯對立，進行一場全球性的「冷戰」。基於兩方陣營都有核子武器，只好自限於冷戰的範圍，而讓各自的附屬國去打「熱戰」去。

在這種情況下，剛被解放而已經初步「站起來」的中國，對於南洋和美澳的海外華人，確有重要和不同的影響。那時候，新中國還未能眞正站起來，不管是進行韓戰也好，還是製造原子彈也好，甚至迎頭趕上歐美、儘快把「工業

革命」提前也好，在在都需要蘇聯的幫忙。後來，毛澤東提出「不斷繼續革命」的口號，發動文化大革命，也帶來偌大效應；但是，除了少數年輕人受到吸引之外，一般海外華人多少都有一點恐懼感。

最初，南洋華僑傾心於新中國的人並不少，尤其有理想的青年學生們，因為向來不滿於殖民社會的不公平，認為本地的統治當權者，不是歧視華人，就是管理腐敗；他們非常仰慕中國的革命英雄，覺得應該效法，跟本地的權勢相互對抗。當然，這也要看原居留國的對外政策如何。如果國家是站在蘇聯一方，像蘇加諾(Bung Sukarno, 1901-1970)的印度尼西亞，同情中國革命，就公然展開活動；又如居留在泰國、馬來亞、菲律賓等國的華僑，他們可能會支持當地的左派政黨，反對國家一切親美反共的行動。

年輕華人跟著潮流，高談革命，是可以理解的。至於老一代華僑之間，態度則有分歧。有些華商因為需要依賴資本主義和自由市場，很可能就會效忠國民黨，反對共產黨，其中固然也有人相當同情新中國、從不贊同國民政府的人士。無論如何，他們都得要考慮去留的決定：如果不打算返回中國，則不得不面對國籍的問題。其中，曾經受過教育的知識分子，尤其在華文學校讀書的人，如果選擇留居本地，對於入籍大事，心裡總覺得不甘情願，感到特別痛苦。至於那些入了外籍的土生華裔，他們做的決定則比較清楚：本來已經多少對中國的黨國政治有所失望，自己又知道不能為新中國帶來任何貢獻，那麼就乾脆轉移其效忠對象，改投入到當地工作，不再直接地關心中國的政治和經濟前途了。

在這個動盪時期，南洋華人之間，顯然有著相當多元的決定和矛盾。最令人側目的，還是在 1950 年代中期，由周恩來在萬隆會議前後所公布的新政策，鼓勵華僑選擇他們的國籍。那項政策內容規定：如果回歸中國國籍而留居在國外的人，希望他們能夠安心守法；倘若決定入籍印尼或其他國家的人，則需效忠當地的合法政府。該項政策決定由於跟中華民國的原則不同，讓老一輩的華僑產生反感。

而美澳華僑的地位就不一樣。本來他們的人數就很少，在二次大戰後，辦

理當地入籍手續也比較容易，加上這些國家的政治觀點明確，言論與思想都相對比較自由。一旦華人決定要居留入籍，都會知道怎麼樣去調適和處理社群的認同問題；至少在法定範圍內，可以公開支持國民黨，或表示同情共產黨。因此，華人社群的政治立場能夠比較公開和明朗。這些地方同樣都有各種華人政治組織和社會團體，並且時常和本地的政黨相互結合，進而也產生如何對應中國政權、主權，乃至意識形態等多重問題。

其實，這一代最特殊的現象，或許並不在於美澳區域，而是在馬來西亞與新加坡這兩個新興國家。新、馬的分家，給予華人極大的衝擊。新加坡獨立後，兩地華人在政治和經濟的壓迫之下，開始有了不同的發展方向。最令人注意的是 1960 年代新加坡華人社會的政黨鬥爭。新加坡本來並沒有獨立的打算，遑論任何準備工作了。當時，英國和馬來政黨都非常反對以華人爲主的馬來亞共產黨；在那樣的反華氣氛下，其他華人政黨儘量避免一切與中國有關的議論、政策和思想，只講當地多元民族社會的經濟、教育和文化發展。儘管如此，政黨之間依然有所謂左、右派的分別，彼此鬥爭非常激烈，雙方都發生過不擇手段之情事。

在冷戰的情況下，親共的社會主義思想被沖淡，左派策略因爲不可能被人接受，勞工階層不得不和企業家、專業人士，及其他中產階級，共同選擇另一條大家能夠合作的道路。新加坡的行動黨就是在如此氛圍中，參與競選而上台的。從中國人的角度看，一個以華人爲多數、並用民主方式所選出的政權，是從來都不曾遇見過的。還有值得注意的是，這個獨立政府甚至對外公開表示：不反對大陸的共產中國、也不支持渡海到台灣紮根的中國國民黨。

其實，那時的政治抉擇還是比較簡單：光譜上共產主義在一邊，而資本主義和民主主義則在另一邊。新加坡既不選擇共產主義，也不選擇民主主義的道路；唯一可走的建國大路，是變相的、折衷的資本主義，可以叫做「混合社會主義理想的資本主義」。更重要的是，如何在冷戰時期左右派各黨不能互相容忍的時候，借用反共資本發展新加坡的經濟，同時又靈活地跟國際社會的各民

主黨派合作，採取一種比較中立的、不反共的立場。當然這個選擇，剛開始並不為社會主義國家接受，因為這樣不偏不倚的政策，確實是很難走得通的。

同樣重要的是，由日本所帶領的東亞財經模式及經驗，運用國家資本來推動和指揮市場經濟，也使得鄰近「四小龍」（即南韓、台灣、香港和新加坡）國家仿效，經濟開始跟著起飛。新加坡由於幅員最小，資源也最少，只好依賴當地人才的培育，藉由嚴格的制度管理，加上行政效率高和官員守法等優勢，並列其中。此外，又因為領導階層深具眼光、有計畫、能守信，又能跟百姓進行溝通，無形中行動黨竟成功地建立一個屬於自己的「黨國民主」制度。

新加坡地理位置的優越，當然也是成功的因素之一。許多國家都認為它的港口居處於印度洋與太平洋之間，不僅重要，而且只要管理得當，不加入別人的政治競爭，成功的希望是比較高的。所以 1970 年代，新加坡政府能夠務實地利用官方力量，解除外來威脅，建立一個比較公平、穩定的主權國，可說非常不簡單。其中是否受到台灣國民黨專政的影響，這方面我還沒有充分的證據；可是，政府跟企業家進行多方面的合作，有相當可觀的成績，若不是受到台灣經驗的啓示的話，至少可說是「東亞四小龍」的共同經驗吧。

新加坡的建國經驗，是海外華人唯一掌權的機會；它的成敗，倚靠當地領導階層投機又迅速地適應當時複雜的政治環境，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但從另一角度看，這表示華人社會所具備的靈活性，證明他們對中國的政治選擇有著相當的瞭解：既不偏於大陸的激進共產理想，也不陷在狹義的民族主義，而是借鑒當時、當地的實際情況，吸收兩岸的經驗，尋找自己所需要走的路。鄧小平在 1978 年年底親自訪問李光耀，足可顯示新加坡在黨國民主方面的成功。

四、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三代

1980 年代以來，局勢的變化可謂又大又快，特別是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更是驚人。鄧小平公開承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認為文革的政治和經濟政策，帶給國家與人民極大的損失；共產黨如果想要繼續保全大局，只好放棄階

級鬥爭和繼續革命的口號，致力向「東亞四小龍」和日本的發展經驗學習。此外，台灣的民主精神，則是超越政治與選舉的範圍，業已深入民間。這是否代表中國人能夠從他們幾千年的歷史傳統裡跳出來，還是一種不得已的反應，借用民主來肆應一時政治危機，我不知道，現在談恐怕還太早。但無論如何，兩岸發展的總體趨勢，多少給海外華人許多新的話題、新的理想、新的希望，自然也會啓發他們的思維。

當然，這一代的海外華人社會也跟以前情況大不相同。東南亞的華人，大多數是土生的華裔，受當地教育影響，加入當地國籍；反觀從中、港、台三地出去的移民人數比較少。那些具有外國人身分的華裔，相當羨慕兩地的經濟發展，也希望中國大陸能夠富強起來；一方面重視做生意的機會，另一方面則希望中國更進步，成爲世界上的現代文明國。至於美澳的華人社會，新移民比較多，可稱爲「新華僑」（也有自稱「新台僑」的），其中有很多受過教育的中等家庭，全家是從中華三地遷移過去的。他們自然關心兩岸關係，也有像第一代的華僑那樣，對中華各地的政治、文化進展，非常感到興趣，熱心地直接或間接參與國內政治活動。但是，出現和過去完全不同的景象，則是少數專業人才竟能投入美澳當地的民主政黨，甚至在官場上出頭。

這些居留在海外的華人，面對黨國政權的性質正在逐漸改變，各處市民對民主的定義和觀點不同，或許需要有新的解釋；可是他們現在對中國的未來抱持何種期待，似乎並不一致。如果有機會讓他們選擇的話，最理想的情況可能是要中國既強盛又民主，甚至比較實際的是：仍希望中國強盛後才講民主。或許更務實一點，就是要中國強盛，它民主與否並不重要。他們固然歡迎國家能有更多民主的進展，但是，沒有也不太要緊。他們或許有信心，認爲民主的發展是遲早的趨勢，現今不必過度緊張和強求。

另外，瞭解又重視中國歷史的海外華人，大致心中會有兩方面的感受。首先，因爲歷史悠久，經歷多次外來的侵略與反抗，每次最終都能再恢復統一之局。其次，在不斷擴大國家版圖之際，一方面具有高度的自信心，藉由國家與

盛，不讓外國來欺負；但另一方面，因爲富強而來的現代民族主義，比較難以控制。中國領導階層能否妥善處理這種過激的熱情，的確是項艱辛的考驗，大家都在拭目以待。

五、結　語

總而言之，三代海外華人各有不同的經驗。他們的「進」或「退」，到底具有什麼意義？第一代的華人，他們是以「進」的態度，支持一切救國活動，只要以統一中國爲目標，並抵制外來強權侵犯主權，任何方式和制度都能接受。但在這些華人社群中，也有少數居留國外的華僑，認爲國家已經失去寶貴的文明精神，政黨鬥爭既殘酷又激烈，使得山河分裂，前途渺茫，因此不僅不進，反而選擇退縮逃避，不再對中國抱有什麼希望。這方面的人固然是少數，但如此「退」的現象也提醒我們：中國人不管在國內或國外，已非傳統的老百姓，他們有新的政治瞭解和考量，有些人的思考往往基於符合個人的環境選擇和決定。

第二代支持新中國的年輕華僑，選擇以「進」的姿態，幫助新中國的科技、政治和經濟發展。由於老一輩對共產主義的態度有所保留，甚至完全反對，有少數人士還是堅持要站在國民黨那邊，不停地反對「紅色中國」。很明顯地，大多數的華僑選擇退後，轉而注意本地政治的發展，關心的是他們在居留國家如何繼續生存下去，儘量穩定自身地位。至於土生華僑比較眾多的地方，情形更不必說，處在如今國際關係緊張的時代裡，漸漸從中國的天下「退」出來。

第三代的變化，仍是跟中國內外發展有直接的關係，但是反應就顯得複雜多了。新移民不一定要像過去那樣地愛國，但仍舊關心國家大事，照顧國內家人，期待中國能夠進步成功。可能最愛國的人，希望的是中國今後的制度更加健全，而中華文明能夠再次輝煌，讓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能認識和欣賞。他們內心既要恢復良好的傳統，同時又能吸取外來的進步和科學思想。大多數的華裔已不再諱言或撇清他們和中華的血緣關係了。

回顧二十世紀，中華民族有著非常多樣的發展變化，如何影響華僑、華人、華裔對國家文明的期望及態度，限於篇幅，在此是說不盡的。海外華人面對多元的情勢，甚至連本地環境也彼此大不相同，其反應當然也不一樣。他們可能依照不同程度的要求，希冀中國能夠保全統一，進而復興中華文明。但是他們到底人在國外，對國內眞實情況的瞭解終究有限：如果不是過分地加以理想化，就是過分地加以惡魔化。即連那些受過教育的知識分子也難免如此，靠著書本傳遞的內容和分析，只能摸索部份且片面的景象。因此，無論他們在境外進行勸說也好，批評也好，不啻可以當做另一種「愛中華」的心態和表現。然而，透過這些內外三代海外華人的認識和經驗證明：只有中國的老百姓和領導階層，才能眞正地瞭解中國人自己的痛苦，包括他們的忍耐和勇敢的精神。換言之，唯有那些身在國內掙扎的民眾，才能眞正決定中華文明未來的命運。